



奇人写奇书

贵州首部乡镇教育志《乌罗教育志》读后

冉苒

外。得到的答复是“你们已经是大学毕业,无需再考”。可是到了1985年4月,家畅再次报名,却获准报考。从全国各高校毕业分配回松桃工作的工农兵大学生,少说也有百余人,像家畅这样执着而迫切的想改变自己身份的人却少之又少。拿到准考证后,他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终于有了一个改变自己身份的机会,紧张的是教学任务重,无暇复习,担心考不上。当年,铜仁地区四县一特区(铜仁县、松桃县、江口县、玉屏县、万山特区)的全国成人高考考场设在铜仁三中,考试时间定在6月。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85年9月,家畅以全县同专业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二年制全日制本科学历。1987年7月,家畅从贵州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回到松桃民族师范学校。次年,被提拔为教务科长。

家畅达观。1988年暑期,家畅在铜仁石灰坡路段发生的客车爆炸事故中险些丧命。事后,他诙谐地对人说道“这是阎王爷不愿过早地收他”。

家畅专业知识扎实,备课认真,授课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其教学效果在学生中口碑极佳,为历届学生所称颂。家畅不修边幅,四十出头,头发花白,胡子拉碴,爱喝酒,喜抽烟,闲暇时不忘搓两把。人无完人。家畅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人是复杂的动物。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甚至把别人的优点当作缺点。有的人将家畅的缺点无限放大,对此,家畅幽默地主动让步,请辞教务科长。

1992年9月,经人推荐,家畅被借调到铜仁一中任教。对用人单位而言,借调的好处在于对被借调者可申请进一步考察。若能录用,则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若不能录用,则将其退回原单位,无需承担任何责任。在借调期间,和家畅一同被借调到铜仁一中的其他几个老师均已陆续调回铜仁一中的其他几个老师。原因不是别的,而是配偶无法随调。

调进铜仁一中无望,又不愿“吃回头草”。路在何方?茫然失措。无奈之下,家畅便只身前往浙江宁波求职。在去宁波的火车上,因钱包被小偷光顾,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时有发生。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宁波市北仑区教委的商调函。拿到商调函后,又担心单位不放心。那时候,没有关系,想调动工作,比登天还难,难就难在单位不放心。正是这个原因,当时铜仁师范、铜仁教育学院、铜仁地区医院等单位的许多人都通过“三不要”途径,南下广东,西去省内其他地方。自重返铜仁,家畅拿着商调函去找铜仁地区教委领导,请求放行,如愿。

1993年9月,家畅泪别故土,娶妇将雏,落户在美丽的东海之滨宁波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畅在宁波市北仑区职业高中潜心教学,从此过上了平静而充实的生活。对此,友人戏称家畅因祸得福,从糠箩跳进了米箩!

古稀之年,满头银发,本应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可他却牵头编纂《乌罗教育志》,精神可嘉,令人敬佩。为何要牵头编纂《乌罗教育志》?动因既简单又朴素。作为游子,深感愧对家乡,总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以作报答。做点什么呢?作为教育工作者,感觉家乡的教育值得写,应该写。要编纂《乌罗教育志》,就要搜集乌罗乡贤的资料。曾凡斌,乌罗镇黔龙村人,1929年生,1950年参加工作,是解放后乌罗的第一个大学生,曾任铜仁地区科协主席、党组书记,在乌罗绝对算得上名人。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家畅致电曾凡斌之次子曾大立教授(铜仁学院英语教授),希望能够提供其父亲的资料,没想到曾教授对父亲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身为教授,对父亲的过往知之甚少,这件事对家畅触动很大,从而使他更坚定了编纂《乌罗教育志》的决心。这就是家畅牵头编纂《乌罗教育志》的动因与心路历程。

从回乡知青到民办教师,从工农兵大学生到大学本科毕业,从黔东小县城到沿海大城市;年逾古稀情系桑梓,家畅其人不可谓不奇。《乌罗教育志》是奇书。

我国现行地方行政体制,大部分地区为省、市、县、乡(镇)四级行政区,乡镇处于行政区末端。在全国范围内,出版过志书的乡镇不计其数,而出版过教育志的乡镇却少之又少。目前仅有《府谷县墙头教育志》(陕西省府谷县墙头乡)、《马良镇教育志》(湖北省保康县马良镇)、《卧岗区蒲山镇教育志》(河南省南阳市卧岗区蒲山镇)、《金石桥镇教育志》(湖南省隆回县金石桥镇)等少数几本。贵州情况如何?贵州有9个市级行政区(6市3自治州),88个县市级行政区(16市辖区10县级市56个县11自治县1特区),1510个乡镇级行政区(305个街道831个镇122个乡192个民族乡)。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目前没有听说贵州有任何一个乡镇出版过教育志。如果说成立,那就意味着《乌罗教育志》是贵州有史以来第一部乡镇教育志。《乌罗教育志》的出版,填补了贵州乡镇教育志的空白。

从前述四部乡镇教育志的断限起止年限看,它们分别是:《府谷县墙头教育志》(明末清初-1999)、《马良镇教育志》(1948-2015)、《卧岗区蒲山镇教育志》(1949-2018)、《金石桥镇教育志》(1949-2022)。《乌罗教育志》上限为

1414年,下限为2024年,断限跨度为610年。即便同断限上限最早的《府谷县墙头教育志》相比,《乌罗教育志》也比它早了两百余年。仅凭这一点,《乌罗教育志》就足以令人称奇。

《乌罗教育志》断限上限为1414年,是不是自我抬高?非也。乌罗镇是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28个乡镇级行政区(5个街道6个乡17个镇)之一,位于县城西部,地处松桃、印江、江口三县交汇处的梵净山北麓,距县城75公里。“乌罗”这个地名,在外人眼里可能寂寂无闻,但只要在对贵州古代史有所了解,却无人不知道它的存在。乌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唐贞观四年(630年)置乌罗洞,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置乌罗长官司,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置乌罗府。乌罗府存续时间不长,仅为26年,但在乌罗置府的次年,即永乐十二年十月初五(1414年11月7日)就尊令设置乌罗府儒学。儒学亦称官学。府儒学就是府一级的官学。按明朝学制,府儒学是官办教育机构,既有教学任务,也对辖区内教育负有管理和督导之责。自乌罗府儒学始,乌罗的官学、书院、私塾,直到如今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610年来延绵不断。准确、清晰地记载乌罗教育610年来发展的真实轨迹和重大史实,完整、集中地勾勒出乌罗的教育先贤以及乌罗教育培养的莘莘学子,《乌罗教育志》不可谓不奇。

《乌罗教育志》由方志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由四川科德彩色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承印,大16K,印制精美,厚重大气。

《乌罗教育志》除序一、序二、凡例、总述、大事记、附录、后记外,分11章34节7目,含各色图片、照片141幅,表格241份,总计68.6万字,详尽论述了乌罗府儒学、松阳书院、四合院学堂、私塾、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行政管理、学校党组织建设、社会助学、教师、学生、教育人物等问题,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编排合理、语言朴实、图文并茂,集资料性、学术性于一体。既为乌罗教育提供了最为全面、真实、珍贵的历史资料,也为乌罗教育后续改革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向。

《乌罗教育志》是成功的。笔者的专业虽是心理学,但早年曾对地方教育史颇感兴趣,曾参与编纂《中国书院辞典》,并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州文史丛刊》《贵州高教》等刊物发表过十余篇有关地方教育史的文章。史与志不同,但两者息息相关。笔者正是因为有此学术背景,才敢作这样的判断。当初,当编纂《乌罗教育志》的消息不胫而走,即便是乌罗本地人,也是各说不一,有的人认为“乌罗教育没什么好写的”。悠悠之口,岂能尽封!志志的意义在于存史、资治、教化。《乌罗教育志》的成功,既是对610年来乌罗教育发展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乌罗教育先贤、乌罗教育培养的莘莘学子的一个交代。

编纂《乌罗教育志》几乎无现存资料可查。李家畅、李万育、曾祥光、杨再江等先生及全体编纂者筚路蓝缕开辟荆荒,不畏艰辛,克服困难,乐于奉献,成就此书。他们的名字,必将为乌罗人所铭记。

毋庸讳言,《乌罗教育志》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篇幅长。造成篇幅长的原因主要是图片多,表格多,材料堆积,叙事冗长。篇幅长导致规模大。《乌罗教育志》有68.6万字,算得上鸿篇巨制。文贵短。把一个乡镇的教育志写成鸿篇巨制,未必恰当。除非经典,大部头著作读来费劲,让人敬而远之。《乌罗教育志》的篇幅要是能够控制在20万字左右,该有多好呀!第二,有跨界之嫌。既写乌罗,何谈冷水?还言石梁?不错,在不同历史时期,冷水、石梁的确隶属于乌罗,问题是,自1992年“撤并建”后,乌罗区已不复存在,现在的乌罗镇、冷水溪镇(含三阳、谢沟)、石梁乡是三个互不隶属的县级行政区。在论述特定历史时期的乌罗教育时,冷水溪镇和石梁乡的教育自然属于其涵盖范围,可是,在资料提供人员名单中出现“冷水溪镇”“石梁乡”这样的用语,在目录中出现“冷水溪镇幼儿园简介”“冷水溪镇教育管理机构沿革及人员”这样的节题,这明显不妥。从“大乌罗”角度来谋篇布局,如今不可立,关键是不越界。当年铜锅煮饭,不分家立业,插手别人家事,别人未必高兴,各自家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要知道,《乌罗教育志》的责任者是乌罗镇人民政府,并没有冷水溪镇人民政府和石梁乡人民政府。再说,倘若将来冷水溪镇和石梁乡也要编写自己的教育志,不知编纂者将作何处理?《乌罗教育志》虽然存在瑕疵,但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笔者并不主张出版乡镇教育志。当然,像乌罗这样文化底蕴深厚和教育历史悠久的乡镇,另当别论。笔者与家畅是故交。得此便利,在成书过程中,有幸成为部分书稿最早的读者之一,因此对《乌罗教育志》的问世,格外珍视,先睹为快。览全书,工作量之浩大,头绪之繁多,过程之艰辛,可想而知。限于学力,对本书成功之处难以作出全面评价,甚至挂一漏万。在谈到书中不足时,言辞尖锐,望编纂者见谅。絮絮叨叨写了这么多文字,权当作为读后感,仅供编纂者参考,以饴读者!

老来忙,人长寿。愿家畅健康长寿!愿本书能够成为您了解乌罗、乌罗教育的一个窗口!愿本书能为您增知、益智!

从肖隆东《世界里的风筝》谈素人写作的双重表达

林汉筠



当新大众文艺正用“人间叙事”重构创作图景,当素人写作者打破层层壁垒,用带着烟火气的笔,把那些被忽略的个体命运片段,从时光的抽屉里翻找出来,那些用朴素、真诚地表达出来的“微小叙事”,像种子般在文字里发芽,生长出打动人心的力量。在岭南素人写作者中,肖隆东的创作总带着乡愁与热爱,他把岭南的山、岭南的城,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酿成了创作的“源头活水”。其新近出版的诗集《世界里的风筝》,用“心灯、心境、心弦、心勉、心书”五个章节绘就成一只会“说话”的风筝,在文字的天空里飞翔,也让人触摸到那份藏在字里行间的分量。

地理迁徙与诗歌创作,是肖隆东的“双重表达”。二十年前,肖隆东从赣南走向岭南,从山林田野到制造业名城。身份变了,工作环境变了,但创作主体没有变,文学创作始终劲头十足。他用“既在场又回望”的视角,描摹东莞作为工业城市的鲜活细节。“像南飞的大雁/奔向改革开放的南方”(《黄江》),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代人背井离乡的壮阔图景;而“岭南大地,记录着我的脚印/多少个细节在时间上打着结/心灵,从此沉静,不再彷徨”,又细腻道出异乡人在漂泊中寻找安顿的复杂心绪。写他乡“工厂的熊胆炉火,科技的月异日新”,又能时时回望赣南故土的山水人文,如《三百山》中对东江源头“五百里原始森林”的深情咏叹,两种文化元素在诗中碰撞、交融,形成了独特的“跨地域诗学”。

作为一个素人写作者,肖隆东善于在“山河”的意象中进行“双重表达”,来完成内心的“精神原乡”。他写眼中的“山”道心中的“山”,指向精神“山”。“我可见的山/内心辽阔,月亮是透明的戒指/人间复杂而唯美”(《山》),将山的“辽阔”与人间的“复杂”形成对比,赋予山以包容万物的哲思。写如山般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大词/牵涉到泥土,森林,田间地头/牵涉到月亮与荷塘/牵涉到春天与山脉”(《父亲》),山的雄浑、沉稳,成为父爱的象征。他写母亲,“母爱是用文字无法描述的一条河流”(《河流》)。诗人将母爱比作奔腾不息的河流,“轻抚母亲走过的山路/那些被她视为知己的泥土,小石头/都是秋天里最温暖的记忆和素描”,用河流流经的痕迹串联起母亲的生活细节。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儒学大师马一浮曾在《贻怀亭口占》里指出,在深刻领悟天地之浩瀚之后,仍要保持对微小生命的珍视与悲悯。肖隆东写作,始终用诗歌将宏阔与细微进行“双重表达”。在《生命是一张单程票》里,他写道“不要跟大地讲哲学/它只爱春天里的草”,在“哲学与青草”“言说与选择”的对立中,戳破人类理性的“虚妄”,回归到对自然本真的敬畏。最终我们会发现:大地不爱复杂的思辨,只爱春天里那株简单却充满力量的草。看似这短短两句诗,有了远超文字本身的重量,揭示了对微小生命的珍视与悲悯。肖隆东抬头/世界也会跟着停下脚步/月色照亮山谷/我身体里有坚硬的石头”,在这首名为《石碑》的诗里,诗人用拟人的手法,串联起“世界停驻”“月色照谷”“体内顽石”三个层次,在景象的捕捉到内在心境的袒露,节奏舒缓却力量绵长。

真正的诗人,首先是个真实的人,然后才是有着“缕缕柔情似水,铮铮铁骨如火”具有鲜明个性的创作者。曾读过文天祥《太白楼》,“男儿斩却楼兰首,闲品《茶经》拜羽仙”,诗人借用茶来作为精神媒介,平衡生死关头的激烈与宁静?有豪迈的刚烈,又有从容的淡泊。肖隆东同样在诗中“刚与柔”进行着“双重表达”。他在“刚”字上,通过大地、山谷、车间甚至时间来抒写。在《时间的骨头》一诗里,“鹰击苍穹长啸,声如鹤鸣之志”来完成刚与柔的微妙过渡,以动态与声响构建出充满力量感的画面,有视觉冲击,又有精神共鸣。他写伟岸的父亲,“总是让我想到/时间上的胎记/关于一段秋天里的故事/收获被写进甘蔗林/稻草人站在夜风中/像个雕塑/一言不发”(《父亲》)。“写柔弱的母亲,“若要对母爱进行深刻的比喻/我会想到/河流,太阳,月亮/甚至一切与暖色调有关的物件/都可以成为母爱的代名词”(《天河》),他没有直接言说母亲的真实,而是借用河流、大海、太阳、月亮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来比喻伟大的母爱。“母爱需要我义无反顾的去歌颂/冬天走了,春天的身体里开始/长满鲜花和种子/我的身体里蓄满了一整年的形容词/这些从未谋面的/汉字,标点符号,都将成为母爱/世界里的风筝”。诗中把对母爱的赞颂,有机地融入“风筝”的核心意象中,读来余味悠长。

儿时读诗,总是喜欢捣鼓诗句藏着的东西。记得在读元马致远远的《天净沙·秋思》时,用自己喜爱的断句进行条理分析,“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每一个词语生发出不同的意境,尤其是后面那句“断肠人在天涯”,让我幼小的心里感受到一种强大的震撼。随着一天天对诗歌的理解,才知道这就是诗歌的意象,是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情致、思想、理趣的深情表达。但无论如何,诗歌抒发出来的那种游子羁旅他乡的辛酸、浓郁不化的乡愁,一点点地镀进心头;诗人那超越时空的艺术形象,成了游子恋乡的一种心灵皈依。《世界里的风筝》,其实就是诗人以笔为线,牵住这个“风筝”为核心意象,而串联起自然生灵的微小、亲情故土的温度与人生哲学的沉思,既延续了素人写作中“以我手写我心”的真挚底色,又凭借细腻的意象构建与深刻的精神挖掘,超越了普通个体叙事的局限,为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兼具“烟火气”与“思想性”的范本。